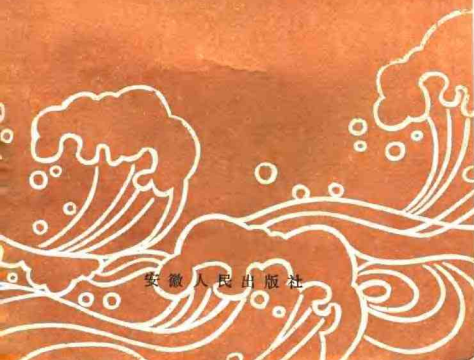


安徽文史资料

第二十二辑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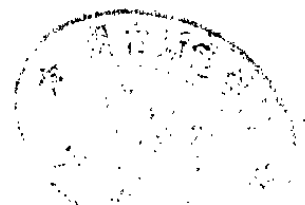
A decorative graphic element consisting of stylized white waves and clouds on an orange background, located at the bottom of the book cover.

rt241/118

安徽文史资料

（解放战争时期）

第二十二辑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1984年·合肥

安徽文史资料

(第二十二辑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7 字数: 15,700

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3,000

统一书号: 11102·57 定价: 0.90元

【限国内发行】

目 录

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十五年	冯纪法口述 侯鸿绪整理 (1)
回忆“三人军事小组委员会”活动的始末	余湛邦 (80)
南进浙赣线, 开辟新地区	朱 农 (113)
合肥解放纪实	郭 鉴 (132)
回忆解放前夕安庆民主党派开展的革命 活动	李湘若 (138)
解放前民盟在安庆活动的一些情况	刘芳松 (150)
解放前夕参与策反工作片断	刘序功 (160)
回忆参加民盟工作的前后	夏继诚 (164)
解放前夕合肥民盟组织的革命活动	董光昇 (173)
合肥民盟迎接解放的一些活动	周介如 (180)
我是怎样加入民盟的	郭 因 (183)
解放前芜湖市民主运动片断回忆	詹云青 (191)
台湾籍医学博士叶松荣	牛广进 (204)
《寒石诗草》摘抄	王钱云 (216)

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十五年

冯纪法口述 侯鸿绪整理

第一章 开始在冯将军身边工作

在西北军军官学校

1928年，我投奔冯玉祥将军统率的西北军，考进了西北军军官学校。

军官学校的校址先是在郑州，后来随部队移防迁到兰封（今兰考县），最后迁到开封。校长由二十五师师长张自忠将军兼任。学校共有两个大队——第一大队（新生）和第二大队。大队为团的建制，下设中队（营）、分队（连）和小队（排），所有队长都是从部队里调来的各级军官。

学校的军事训练是严格的，但我总觉得有点过分了。比如冬季行军一定要选择大风雪的日子，而且要求练赤脚行军，结果每次行军归来，总有不少人病倒了。在训练的科目中，给我印象最深的，就是每天清晨的“朝会”。那时我们在开封举行朝会，都要跑步到南门外的“演武厅”进行。朝

本文口述者现已退休，为上海市民建成员，本文整理者是蚌埠日报社编辑。

会宣布开始，由校长张自忠登上指挥台，大声喝问：

“你们的父母是什么人？”

众答：“老百姓。”

又问：“你们的兄弟姐妹是什么人？”

众答：“老百姓。”

又问：“你们入学之前是什么人？”

众答：“老百姓。”

这种“官兵问答”的仪式最初是由冯玉祥将军设立的。当时代理河南省主席邓哲熙、训练总监石敬亭都来参加过这种仪式。仪式完毕，官长开始训话；训话结束，便开始了军事课训练。为了给两个大队的学兵进行示范，往往把第二十五师的士兵拉来和我们一起操练。这些士兵在北方严寒的“三九”天，光着上身大声喊叫着练劈刺，使我们看得目瞪口呆，赞叹不已！

学校纪律规定，学兵一律剃光头，不准喝酒和抽烟，如有违犯必遭痛斥。纪律是严格的，但保证纪律执行的不是思想教育，而是旧军队的那套惩罚制度。记得在一次朝会上，张自忠将军因对训练极为不满，一时火起，当场命令两个大队长原地跪下，然后，拎着棍子走到第一大队张大队长跟前，喝叫他：“趴下！”张大队长乖乖地趴在地下，屁股上挨了几棍子。张自忠随即又走到第二大队的刘大队长跟前，同样命令他“趴下！”可是这位刘大队长十分乖巧，他突然跑了，但没跑多远又面对着张自忠跪了下来。这种体罚的恶习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军官学校里发的军服上有两个标志，一个是老百姓都能看到的，就是在军服的左臂上有一个椭圆形的臂章，上面

印着三行字：“不扰民，真爱民，誓死救国”。另外还有一个标志是隐蔽的，老百姓是看不见的，那是在军上衣的沿襟里面，缝着一寸长的布条，上面印着一行小字：“一粒子弹打出山海关！”

这两个标志都是冯玉祥将军亲手制定的。第一个标志，是告诉西北军的官兵们不要忘了民众和国家；第二个标志，是要西北军的官兵坚决与奉军张作霖誓不两立，打出山海关，活捉张作霖！

冯将军第一次接见

1929年，我从军官学校分配到第二十五师十六旅任职。那时的旅长是王克明，他是安徽省蒙城人，说话声音洪亮，听起来咋咋呼呼的，所以他有个外号叫“王咋呼”。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把他的旅长拿掉了，任命他为张自忠的副官长；王咋呼十分不满，气恼之下，便跑到了韩复榘那里。可是没过多久，他又从韩部跑了，韩便下通缉令捉拿他，于是他又跑到了高树勋部第二旅李席儒那里隐藏起来。据李席儒后来跟我说，那时王克明每天求人为自己测字算命，这都是后话了。我在十六旅旅部开始当一名录事，后来逐步升到少校参谋官。

1930年冬，爆发了冯阎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。但在蒋介石的百般利诱和离间之下，阎锡山动摇了，晋军秘密撤退，西北军失利，退缩到山西的曲沃县一带。那时，部队等待着整编，军心惶惶。有一天，我在军官学校同学、同乡，当时已是西北军总司令冯玉祥将军传令官的冯文华来通知我：

总司令要你去一趟。我当时弄得莫明其妙。心想：我从巢湖家乡考入军官学校是改了名的，从军官学校分到二十五师，总司令也是不知道的，今天怎么总司令突然知道我在这里？于是我询问冯文华，才弄清了事情的经过。原来是这样的：一天晚上，总司令和冯文华闲聊起巢湖家乡的事来，谈话中提起我的父亲，总司令说：那个人不争气！冯文华说：他不争气，可是他有个儿子在我们西北军里干得不错。于是，总司令便有兴趣地询问了关于我的一些近况，并要冯文华记着：抽空把冯纪法叫来见见。

那时，冯将军住在侯马，离我们旅的驻地不远，我借了一部自行车，一口气骑到总司令住的地方。

冯文华带着我去见了总司令。

我看到总司令穿着一件棉袄，腰间扎着一条布带子，心想：这就是指挥几十万西北军的冯玉祥吗？要是不在部队里，我真的会把这个又粗又高的大汉当成种田的乡下人。总司令看我愣在那里，问我：“你原来叫什么名字？”我说：

“叫冯继发。继字是按家族辈分排下来的，继发的意思就是要我继续发财，我嫌它太俗气，报名时就改了！”

冯玉祥一听哈哈大笑起来。接着又问我：“你来西北军干什么？”

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才好，就说：“家里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。”我一五一十地介绍了许多家乡的苦难生活。

冯将军一声不吭地听了我的介绍，他说：“当西北军也是要吃苦的，还要打仗，死人，你想过吗？”

我大声地回答说：“不怕！”

冯将军站起来，连连地说：“好，好。”又给我讲了一

些爱民救国的鼓励话。临走时，他从桌子上拿起一本红皮子的铅印小册子递给我，说：“送给你吧。今后要多读点书。”这本红皮小书名字已忘了，书里面好象讲的是一些经济上的问题。

这就是冯玉祥将军第一次接见我的情形。

到冯将军身边工作

1931年，西北军遭到挫折之后，冯玉祥将军一气之下便上了泰山。

那时，我们的部队开始整编，各级官长比从前都降两级留用。因编额定额有限，人数众多，困难重重，军心一片混乱。当时，我看看国家四分五裂，想想自己前途十分渺茫，心情是灰暗的，于是我想到了冯玉祥将军，我想，应该上泰山，听听他的意见。

在山上，我把自己的忧伤心情作了一番倾诉。冯将军说：“我这里现在没有什么事好干了，我要安下心来读点书。你也去读书，你先回家去读书；读书是长志气的，一个人有了志气就好办事了。

就这样，我辞别了冯将军回巢湖家乡了。

1933年春天，我正在家乡一边务农，一边读书，冯将军的传令官冯文华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，他拉着我的手，笑嘻嘻地说：“纪法，赶快准备一下，冯先生召唤你了。”我听了这一声“召唤”，心里的高兴劲就不用提了。好啊，冯将军又要举旗大干了！

过了两天，我兴冲冲地跟着冯文华离开家乡北上。

1933年的张家口是乱哄哄的，到处是当兵的，还有不少学生，还有一些俄国人。那时，冯将军组织的“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”总司令部设在一个图书馆里，冯文华把我带到冯将军跟前报到，将军见了我，一招手说：“好，你来了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抗日同盟军的一员了，跟在我身边吧。”打那以后，我便开始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工作，直到1947年9月，将军命我回国办事，才离开他的身边。

在总司令身边工作，对他的称呼必须改口，不能再称“总司令”，而要称“先生”。冯玉祥将军说：“什么司令啊，将军啊，我岁数比你大，你就叫我‘先生’。有人岁数比我大，我就叫他一声‘先生’。记住！”对于这种称呼，开始我别不过来，但是慢慢地我也就习惯了“冯先生”这个称呼。

讲古书的邓鉴三先生

为了工作上的方便，遵照冯先生的意思，我在冯先生住的房间里靠门边铺了一张小床。我发现，在冯先生的床铺对面还有一张床。这是谁的呢？到了晚上，冯先生陪同着一位胖胖敦敦的老先生进来了。老先生穿一身长袍马褂，嘴唇上边留着两撇往上翘的八字胡，显得十分神气。后来才知道，这就是冯先生平日尊为师友的“邓大哥”——邓长跃先生（字鉴三）。冯先生对面的床铺就是他的。邓先生那时已没有什么军职，只是随军常给冯先生讲讲古书，如《史记》、《礼记》、《三国志》等等，而讲得最多的要数《资治通鉴》了。

提起邓鉴三先生，不妨在这里插叙一段早年的闲话。

邓老先生早年在冯玉祥先生的第十六混成旅当过军医官，后来在陕西还任过民政厅长，代理过一段陕西省主席的工作。大概是在1916年吧，冯先生署理湖南常德镇守使，当时恰好临沅一县无主，于是冯先生便委派邓鉴三去当县知事。巧得很，那时我父亲正从家乡奔来求事，冯先生平日是极不愿意留本家在身边做官的，便说：那你就跟邓先生去干吧！但又嘱咐邓鉴三：不得因是我的本家便可放纵。

邓鉴三到了临沅任上，便委了我父亲一名科长的差事。邓老先生平素为人清廉正直，可称得上是一位两袖清风的清官了。因此，遭到了县里那一些捞惯油水的小官吏们的白眼，牢骚怪话四起。可是邓老先生治理有方，受到了冯先生的嘉勉。有一次，有几个人又在那里大发怨言，其中就有我父亲在内，这一次却正好被邓老先生亲耳听到了，于是便毫不留情地把我父亲给免职了。对这件事情的处理，冯玉祥先生是极力称赞邓老先生正直不阿的，后来还把这件事记载到他写的《我的生活》一书中，只是没有点出我父亲的名子罢了。冯先生光明磊落，不循私情，这是当时一班军阀官僚们所不可比拟的！

邓鉴三后来知道了曾被免过职的科长，就是我的父亲时，对我毫无嫌弃之意，而总是以长者教我，借古人正直言行晓我以大义，训我以大德。他在我的本子上曾经题过几句话：

“学学好，不学不好。学者如禾如稻，不学如蒿如草。如禾如稻兮，世之精粹，国之大宝；如蒿如草兮，耕者厌烦，锄者烦恼。他日面墙，悔之已老；如欲求学，务要趁

早。”

这篇题字，我一直保存着。

邓鉴三先生以后在南京、汉口、重庆，都在冯先生身边。他是河北省静海人，会唱一口大鼓书，在武汉、重庆时十分活跃。在联欢会上，只要邓老在场，冯先生总是大声喊着：欢迎鉴三先生来一段，于是邓鉴三便从容不迫地上台唱一段大鼓词，所以，人们都亲切地戏称他叫“邓大鼓”。

李斡从北平来“劝告”

在张家口图书馆的总司令部里，抗日同盟军誓死大会的筹备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着。这件事使蒋介石坐卧不安，接连不断地派人到张家口来当说客，“规劝”冯先生“不可妄动”。就在这时，从北平来了一位名叫李斡的人，他原是冯先生早年的老部下，当过骑兵第五旅的旅长和宪兵司令。他一见到冯先生，毕恭毕敬地行了举手礼，冯先生问他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李斡十分恳切地说：“我是来向先生进一言的。眼前日本人已靠近张家口，形势十分险恶，而先生又无守土之责，何苦在这里担这一分危险呢？我替先生着想，还是希望先生以安全为重，退居到南京、上海为上策。”

我看冯先生有点生气了。他站了起来，只听他大声斥责道：“显堂（李斡的号），你这叫不懂事！不懂事是因为你不读书，不明理。你这是爱护我吗？古人说过：‘君子爱人以德，小人爱人以姑息。’要是真的爱护我，你就会这样对我说：先生，日本人这样欺侮我们，你要带领我们一起去和

他们拚了！”说到此处，冯先生越说越激动，“民族大敌当前，我冯玉祥能退走吗？能去当一名软骨头的亡国奴吗？我冯玉祥能招三十万人，就抗三十万敌人；能招一万人，就抗敌一万；就是我一个人，打死一个日本兵我够本，打死两个我赚一个！”接着，冯先生话锋突然一转，质问李忻：“谁叫你来的？”李忻不敢正视冯先生一眼，只是低头坐在那里。冯先生一字一句地说：“你回去告诉北平的人，我姓冯的宁愿死在日本人手里，也决不做软骨头的亡国奴！”

我看看那位宪兵司令，这时满脸通红。正在这十分尴尬的时刻，王瑚老先生进来了。这位老先生满头白发，是前清的一位翰林，因为字铁珊，所以大家都尊称他为“铁老”。铁老当时也是给冯先生讲课的，他讲的是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。冯先生对讲这些书很感兴趣，因此下了不少功夫，后来在泰山上冯先生又听范明枢讲过《左传》，还写了一本《读春秋左传札记》。依我看，根基在张家口就已经打下了。

再说，王铁老进门一看，心里明白，在中间说了几句圆场的话。冯先生平日对铁老是尊敬如师的，听了他的话，就不再说什么，紧张的空气缓和了。李忻也就乘机溜走，以后再没敢来找冯先生。

内幕复杂的谋杀案

当时在总司令部里，还住过一个人，就是以后变成托派的张慕陶，那时他是政治部的主任，住在楼下。为什么我要提起此人来呢？因为在张家口曾经发生过一件谋杀案，听说

牵涉到他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

冯先生早年有一位部下名叫魏宗晋，此人曾在西北军督办署任过财政委员长，在张家口，他帮助冯先生筹办经费，十分得力。那时，他住在一家旅馆里。有一天，冯先生派勤务兵王华峰和王大勇去接他来议事，魏和冯谈过话之后，乘一辆人力车由王华峰送回旅社，走到半路上，王华峰突然拔刀刺杀了魏宗晋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到总部。

这件凶杀案立即在张家口哄起来了，而且谣言四起。冯先生很快得到警备司令部的报告，并把那个人力车夫带到总部，冯先生下令全部人员集合，那个车夫很快便指认出凶手王华峰。当时就把王华峰关押起来，进行审讯。

王华峰是安徽凤阳人，当时只有二十岁，他为什么要干这种事？据后来他在军法处招供：他是受人指使的，答应事成之后给他一笔巨款。问他指使人是谁？他先是不肯说，后来吞吞吐吐地说张主任（即张慕陶）知道此事。至于张慕陶为什么要干这一手？我就不得而知了。王华峰招供出来以后，张慕陶即乘混乱之机溜走了。后来，王华峰被枪决。

第二章 二次上泰山

发愤读书

冯先生的抗日爱国行动，给日本侵略者以迎头痛击，但却遭到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无理指责，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破坏下，抗日同盟军孤军奋战，终于失败。1933年8月5

日，冯先生宣告辞去总司令的职务；14日，在宋哲元等人的陪同下，乘一列装甲车离开张家口，带着两个步兵团和一个手枪营开往泰安城。两个步兵团驻扎在泰安一带，手枪营跟随冯先生上了泰山。

在泰山上，冯先生住在五贤祠内，终日读书习字，孜孜不倦。当时，他的心情是十分悲愤的，在他书房的墙壁上刻着一行诗句：救民安有息肩日，革命方为绝顶人。这就是当时冯先生心情的写照。

为了读书的方便，在冯先生住处附近，专门设了一个小型图书馆。负责管理这个图书馆的是一位青年人，这就是后来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当顾问组长的王倬如同志。当时好象他是才上山的，在张家口未见过。他是通过什么关系来的，我已记不清楚了。王倬如以后在南京、武汉和重庆，都和我一起在冯先生身边共事，他是秘书，我是参谋。

冯先生喜欢散步，而且喜欢在散步时听随从给他朗读书文，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。冯先生散步不喜走大道，总是拣那些小路或树林子走。遇到这种时候，我总是格外小心，要一边探路一边看书朗读，稍一分心，不是绊脚就是读错了，而先生总是温和地说：重来，重来。在这以后的十多年里，冯先生一直保持着这个散步听书的习惯，而我在这样长期的伴读之中，也增长了不少知识，得益非浅。

研究室的先生们

冯先生在山上读的书很杂，真是上自天文下至地理，求知欲是十分旺盛的。为了探求真理，寻找一条救国救民之

路，冯先生不断邀请了一些有学识的学者名流上山讲课，为此，特意成立了一个研究室。说起研究室来，早先冯先生是把这个机构看作是自己的智囊团，不仅和这些先生们在一起研讨学问，而且大凡军政要事都要请教大家，然后由他决策。后来冯先生的兵权没有了，这种作用也就逐渐地消失，研究室成了名符其实的研讨学问的机构。

在泰山时，研究室设在普照寺，负责人是宋端华，字斐如，台湾人，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。宋常穿一件灰色长衫，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，对人十分温和。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去了台湾，在1948年的台湾“二·二八”事件中牺牲了。冯先生的研究室不论在南京、汉口、重庆，都一直保留着，由李达先生主管。

上泰山讲课的先生们不断更迭，大致都在山上讲二、三个月的课就下山了。我记得的先生们有：吴组缃、范明枢、邓初民、李达、翦伯赞、陈豹隐、董志诚、刘屹夫、陈定民、陶宏、梁浚九、赵澄之、赵望云等。每天吃过早饭，先生们便开始上课。每天上午是三个小时，下午是两个小时。上课时，冯先生喜欢问，喜欢联系实际，不仅对文科是这样，就是对理工科也是如此。为此，还专门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科学实验馆。给冯先生讲天文课的叫陶宏，是陶行知的儿子。他白天给先生讲过天文理论之后，当天晚上必定要约冯先生一块登上卧云台，进行天象实际观测。

研究室的先生们都是对不同学科有卓越见识的人，有不少是共产党人，他们对冯先生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。冯先生过去是出名的“基督将军”，他讲的是平等、博爱，他不仅自己信教，而且动员西北军全体官兵一律信奉基督教。

但是他受骗了。他悲痛地在一首诗中说：

“可敬的同志们赶快醒起，
赶快的注重科学，研究真理，
打破一切迷信，
要靠自己救自己。”

后来，冯先生声明退出了基督教，并表示西北军全体官兵一律退出基督教。接着，在孙中山先生倡导的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的三大政策指引下，冯先生对三民主义产生了希望，并宣布国民军全体官兵集体加入国民党。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，不仅不为民造福，反而为四大家族谋利，并且把冯先生苦心经营了二十多年的西北军分化瓦解，消灭殆尽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日蒋勾结，内外夹攻，又迫使冯先生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处于极大的困境。这一个个接连不断的打击，使冯先生的希望破灭了。他痛定思痛，开始觉悟了。他告诉我们：“求真理还须努力向前进！”

真理在哪里呢？冯先生认真读书，在李达、翦伯赞诸位先生的开导下，终于在黑暗之中看到了一线光明，悟出了一条真理：“若不信辩证唯物论则我民族不能复兴。”对冯先生来说，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思想飞跃。为了纪念这个认识上的飞跃，1935年8月3日，冯先生特意把上述十六字亲笔书写出来，在普照寺上边的树林中，立了一块石碑，把这十六个字请石匠镌刻在碑石上。

这里顺便提一下冯先生的体育锻炼。冯先生每天起得很早，先是散步，打几套拳，然后就是举石担子。冯先生力气很大，能一只手把石担子举起来，上下举几次，再转几个圈子。